



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

阿瑟·韦利汉学 研究策略考辨

冀爱莲◎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阿瑟·韦利汉学 研究策略考辨

冀爱莲◎著

责任编辑:詹素娟 周文婷

装帧设计:东方天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瑟·韦利汉学研究策略考辨/冀爱莲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

ISBN 978-7-01-018384-8

I. ①阿… II. ①冀… III. ①汉学-研究-英国 IV. ①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0842 号

阿瑟·韦利汉学研究策略考辨

ASE WEILI HANXUE YANJIU CELÜE KAOBIAN

冀爱莲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5.25

字数:450 千字

ISBN 978-7-01-018384-8 定价:7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本论著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中英文化交流语境下的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研究”（项目编号为11YJC752007）的结项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学大众化：阿瑟·韦利（Arthur Waley）中国文学英译研究”（项目编号为13BZW020）的中期研究成果。

总序

2004年10月,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批建设福建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人文福建发展研究中心,并于2011年被评为省高校优秀社科研究基地。在此基础上,学校于2014年4月成立了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聘任郑家建教授为研究中心主任,以更好地发挥文学院在中华文学传承发展方面的科研优势,为我国社会文化发展以及闽台文化合作交流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参考。该研究中心于2014年6月经过专家评审,成功晋升为福建省首批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高层次学术平台,担负着组织科研创新团队、产出重大研究成果、创新科研管理体制机制、提供社会咨询服务、培养优秀科研骨干、促进学科建设发展的重任。省社科基地实行“机构开放、人员流动、内外联合、竞争创新、产学研一体化”的运行机制,经过几年的建设,力争成为国家或省级高层次智库或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依托福建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福建省特色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和3个福建省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以及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和博士后流动站、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和博士后流动站、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以学科发展与

社会重大问题为导向,结合文学院的既有学术传统,确定中心的重大学术课题,围绕国家提高文化软实力与福建省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大需求,在全球化语境中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

中国语言文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不但成了联结全球华人共同家园的精神血脉,而且对中华文化在世界的流播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语言文学在传承中华文明及促进闽台文化的合作交流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无可替代的作用。福建师范大学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的学术宗旨,是以历史和现实为基点,对涵盖古今的中国文学,尤其是闽台语言、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的渊源流变进行全方位的梳理,为当前建设繁荣和谐的社会文明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加深两岸人民共同构建精神家园的情感联络,为促进闽台文化交流与中外文化交流作贡献。

研究中心聘任国内著名专家担任顾问和学术指导,对中心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汪文顶教授担任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副校长郑家建教授担任中心主任,研究中心的日常事务工作由常务副主任葛桂录教授负责。本中心的特色研究方向有四个:闽台语言文献与文学交流研究方向,负责人为林志强教授、郑家建教授;文体学研究方向,负责人为李小荣教授;中华文学域外传播研究方向,负责人为葛桂录教授;当代文学教育及语文教育研究方向,负责人为赖瑞云研究员。

研究中心将以国家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大需求为导向,以研究项目为纽带,以研究方向组成的创新团队为载体,以出精品成果为目标,努力强化特色与优势。联系整合省内乃至国内相关高校、科研机构的学术资源,建立健全协同创新机制,造就一支高水平、结构合理和可持续发展的科研创新团队,打造一个在全球化语境中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重点研究基地,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专门人才库和人才培养培训基地。

为促进研究中心建设目标的实施,我们在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集中出版“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福建师范大学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学术集刊”。该集刊主要收录研究中心同仁高质量的个人学术著作。列入研究中心学术集刊首批出版的十本著作,绝大多数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如

《晋唐佛教文学史》(李小荣著)、《中国英国文学研究史论》(葛桂录著)、《冈仓天心研究:东西方文化冲突下的亚洲言说》(蔡春华著)、《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涂秀虹著,此项为阶段性成果)、《视域与诠释:明代的中古诗歌批评》(陈斌著,此项为阶段性成果)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如《台湾诗钟社团及相关组织考略(1865—2014)》(黄乃江著)、《〈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研究》(李春晓著)、《阿瑟·韦利汉学研究策略考辨》(冀爱莲著)的结项成果。这些成果在课题结项评审专家审定意见的基础上,再次打磨修订,因此保证了较高水准的学术质量。研究中心成员承担的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结项成果,也拟列入这套学术集刊出版。另外,本研究中心与文学院还合作搭建了两个学术平台《细读》《圆桌》,研究成果亦由人民出版社刊行,为国内外学者诠释中华文学经典、探讨重大理论问题、思考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方向提供重要的学术阵地。

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

2016年8月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 1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3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8

第三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 56

第一章 17 至 20 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汉学 / 65

第一节 “汉学”及其词义辨析 / 67

第二节 英国汉学的萌生及发展 / 76

第三节 20 世纪上半叶英国汉学的新走向 / 95

第二章 汉学:阿瑟·韦利的边缘化选择 / 117

第一节 汉学学科的边缘化 / 119

第二节 犹太民族身份的边缘性 / 128

第三节 离群寡居的个性 / 137

第三章 阿瑟·韦利汉学成就与汉学观 / 147

第一节 阿瑟·韦利汉学成就概述 / 149

第二节 阿瑟·韦利的中国文学观 / 157

第三节 阿瑟·韦利的翻译观 / 176

第四章 散体翻译与跳跃式节律:阿瑟·韦利的诗歌翻译策略 / 189

第一节 散体化直译:阿瑟·韦利早期诗歌翻译的选择 / 191

第二节 跳跃式节律:阿瑟·韦利译诗的节奏意识 / 209

第五章 人类学解读:阿瑟·韦利汉学研究策略之二 / 229

第一节 人类学:汉学研究的新方法 / 231

第二节 《诗经》的人类学解读 / 236

第三节 《九歌》与萨满教 / 258

第四节 唐前诗歌译介的文化视角 / 274

第六章 传记:阿瑟·韦利汉学研究策略之三 / 291

第一节 传记与文化交流 / 293

第二节 《李白生平及诗作》 / 310

第三节 《白居易生平及时代》 / 327

第四节 《十八世纪中国诗人袁枚》 / 345

结论 / 361

参考文献 / 367

附录一 阿瑟·韦利译述著作分类编目 / 386

附录二 阿瑟·韦利家族世系表 / 388

后 记 / 393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缘由

具有学科意义的欧洲汉学产生于 19 世纪中叶,是中西文化交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汉学愈发受到学界的重视,汉学所包含的对中国文化全方位、多层面的介绍、翻译和研究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路径与窗口。20 世纪中叶,随着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汉学逐渐引起欧美学界的重视。就英国汉学而言,无论是历史悠久的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还是 19 世纪中叶创办的纽卡斯尔大学、杜伦大学、利兹大学等,都设有汉学教授席位,开设汉语语言与文学、历史、文化等相应课程。其中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牛津大学东方系 (Oriental Institute) 和圣安东尼学院 (St. Antony's College) 的亚洲中心 (Asian Studies Centre)、剑桥大学东方系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爱丁堡大学中文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杜伦大学的东方学院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执英国汉学之牛耳,是培养不列颠中国通的主要阵地。他们机构设置成熟,教学模式系统化,且具有一定规模的教职人员,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主要桥梁,为中国文化传入欧美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英国汉学之所以有当下的规模,除却政府的努力,其主要功绩应归于那些筚路蓝缕的汉学家。他们如同渡口的摆渡者,孜孜不倦地将东方文化翻译介绍给欧洲读者,季羨林称他们为“西方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中”那些

“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人，是21世纪中国文化重放异彩的“中坚人物”“中流砥柱”。^①此种说法虽有些许夸张，但汉学家传播中国文化之功赫然可见。就学科研究而论，当下中国社会人文学科的研究，如果仅以国内学界的成果为参看资源，没有考察汉学家在此领域的研究成果，难免固步自封，贻笑大方。严绍璁先生曾告诫国内研究者：“作为我国人文学科史的表述以及我国人文学者的修养，如果缺失了对 Sinology 的把握，事实上是不完整的，会造成‘学科缺损’。”^②此外，汉学家从异文化的“他者”身份出发，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因袭的固定程式，理解的角度自然比中国学者更为多元。这一点，民国学界的诸多前贤早有定论。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就认定汉学家“多不为吾国古代成见陋说所拘束，其所著书往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不可一笔抹杀也。”^③他还在1925年6月12日为华北协和华语学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所作的演讲《当代汉学研究》（“Sinological Research at the Present Time”）中将西方汉学的成就总结为三个方面：研究范围的拓宽；系统化的材料整理；采用新材料进行比较研究。^④民国史学界也有“外人之致力汉学，为期虽短，而进步惊人”之赞叹，并且指出“欧美汉学家能以科学方法处理史料，其研究之精细，立论之精辟，多为国人所不及”的现状。^⑤

① 季老之所以有此说法，因为他认为“西方近代文化带给人类的不是只有幸福与进步，也有灾难与弊端。……现代世界的所谓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就是西化。西方以外的国家，把西方的好东西西化来了，西方文化造成的这些弊端，威胁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也随之而来。”面对此人类的生存危机，季老以为解决之法唯有利用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精粹，来拯救西方。而能认识到这一点的西方人寥寥无几。这些为数极少的人，季老认为就是“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汉学家。季羡林：《重新认识西方汉学家的作用》，季羡林研究所编《季羡林谈翻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59—60页。

② 严绍璁：《我对国际 Sinology 的理解与思考》，载《国际汉学》第十四辑，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③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2·1915—1917》，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1页。按：20年代，他对末代皇帝溥仪的外籍恩师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法国知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瑞典考古学家安德森（J. G. Anderson）、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德国汉学泰斗卫礼贤（Dr. Richard Wilhelm）、俄国汉学家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Aoki Masaru）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更是赞誉有加，相关内容可参看冀爱莲、郭炳通：《胡适海外汉学观研究》，《安徽史学》2010年第3期。

④ Hu Shih, “Sinological Research at the Present Time”, 载周质平、韩荣芳整理：《胡适全集·英文著述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8—61页。

⑤ 《本刊下年度编辑计划》，《史学消息》第1卷第8期，1937年7月1日。

陈垣、陈寅恪、傅斯年、周作人等甚至大力呼吁学界急起直追,努力将汉学正统搬回北平。^①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学界重启该学科的研究,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一个初具体系的学术研究领域。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苏州大学相继成立海外汉学研究机构,专事汉学研究。近年来在该学科领域已出版了一大批研究著述,除却将大量的汉学著述翻译出版外,学苑出版社出版了“列国汉学书系”,其中欧美各国汉学史的编纂是目前国内汉学研究的基础性成果。此外,从翻译的维度研究汉学文本的得失也是学界研究的一大领域。近几年来,对经典文本外译史的研究成为国内汉学研究的又一新的趋向。围绕某一汉学家展开的个案研究也有一些初步成果,但还未形成规模,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汉学家是海外汉学发展的中流砥柱,也是钩沉海外汉学发展史,梳理中外文学、文化交流情状不可或缺的基础对象。在文化交流频繁、中国文化日益受到海外重视的今天,汉学家个案研究不仅可以从学术史的维度考量他们在所在国汉学史的地位及影响,他们翻译研究中国文化的方式、路径更可为当下的文化交流提供有效借鉴。

阿瑟·韦利(Arthur Waley, 1889—1966)是20世纪英国汉学的集大成者。帅雯霖将其与19世纪著名的外交官汉学家翟理斯(He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20世纪后期牛津大学万灵学院中文教授、《红楼梦》的英译者戴维·霍克思(David Hawkes, 1923—2009)并称为英国研究中国文学的三大家。^②李真在《英国汉学的发展》一文中认为翻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 1900—1995)、阿瑟·韦利和戴维·霍克思是20世纪英国汉学的三位大师。^③学界给予阿瑟·韦利此等赞誉,主要基于他对汉学发展的突出贡献。他一生著述宏富,生前共出

① 具体内容可参看李孝迁:《“他人入室”:民国史坛对域外汉学的回应》,《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② 帅雯霖:《英国汉学三大家》,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五集,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8页。

③ 李真:《英国汉学的发展》,张西平主编《西方汉学十六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第261页。

版过著作 41 部,学术论文 82 篇,书评 148 篇。^①就著作而言,中国诗赋翻译 13 部,小说翻译 1 部,中国儒道典籍 3 部,诗人传记 3 部,绘画、佛教、历史研究著作 5 部,日本文学译作 11 部,原创的数量较少,单行本出现的仅有 1 部。其中翻译研究中国的著述有 29 部,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82 篇论文中,64 篇以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就研究范围而言,阿瑟·韦利的著作涉猎广泛,诗赋、小说、敦煌变文、佛教文献、历史知识、民间传说等领域都有涉及,为英伦大众开启了一扇中国文化之窗,使他们得以从中窥望中国多姿多彩的文化景观。阿瑟·韦利因此成为英语世界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式学者。他的译作被英语世界许多文学选本收录,部分译诗被谱曲传唱,有的甚至被选入中学课本,成为当今英语世界普及文学教育的主要文本。而今,阿瑟·韦利去世已近半个世纪,但他翻译的《诗经》《论语》《道德经》《170 首中国诗》《西游记》至今依然是译界推崇的经典文本,在英语世界依然颇具影响力。不仅如此,他的译本在国内翻译界也颇受学界重视,1995 年,由时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任继愈先生任顾问,国内一流学者、翻译家着手编写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大中华文库”启动,该套丛书主要出版百年来中国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最具代表性意义的经典译作,向世界宣传中国文化。截至 2013 年年底,该套丛书已出 115 本,其中《论语》《道德经》的英译本选择的就是阿瑟·韦利的译本。

成果如此卓著的汉学家阿瑟·韦利,虽然学界已有一定的关注,但全面系统的研究尚不多见。20 世纪 90 年代初,英国汉学家、时任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教授的卜立德(David Edward Pollard)在谈及学界对于戴维·霍克思的研究现状时感叹道:“阿瑟·韦利是一个有待探究的汉学研究者。”^②

① 此数字的统计依据弗兰西斯·约翰斯(Francis A. Johns)编纂的《阿瑟·韦利书目》(*A Bibliography of Arthur Waley*)1988 年的修订版。著述部分,弗兰西斯·约翰斯统计的数字为 40 本,寓言故事《在展览馆里》(*In the Gallery*)是博纳小姐(Miss Boner)出资在瑞士苏黎世出版的私人刊印本,此书的手稿为博纳小姐收藏。1949 年冬,该文刊载于《科恩希尔杂志》(*Cornhill Magazine*),后收入 1964 年出版的《蒙古秘史及其他》(*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nd Other Pieces*)。此处将其归总为 41 本。

② David Edward Pollard,“(Untitled Review) *Classical, Modern and Humane: Essays in Chinese Literature* by David Hawkes, John Minford, Siu-kit Wong”,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 (CLEAR)*, Vol.13 (Dec. 1991), p.191.

近些年来,研究阿瑟·韦利的论文虽日渐增多,但大多集中于译文文本的正误辨析,而把阿瑟·韦利作为主要研究个案,对他的生平、翻译研究予以全方位考察依然很欠缺。而从文化交流的视域着手,通过史实的梳理、文本的详尽分析考察他采用的汉学研究策略的著述更是寥寥。为此本著述拟以阿瑟·韦利的著述和论文为研究的基础,结合中英文化交流的史实,分析研讨阿瑟·韦利在长达五十年的汉学生涯中所采用的研究策略,借此努力展示他在汉学领域的重要成果,为当下的中英文化交流寻求方法论的借鉴。

第二节 文献回顾

一、国内研究资料综述

阿瑟·韦利虽在汉学界声望显赫,但学界对他的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稍显不足。国内对阿瑟·韦利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段:民国、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90年代末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

民国期间的阿瑟·韦利研究主要集中于两大领地:一是中国出版刊行的英文期刊、报纸,一是中国文人的书评、日记。最早刊载阿瑟·韦利文章的期刊是1919年年初由传教士塞缪尔·库寿龄(Samuel Couling, 1859—1922)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期刊《新中国评论》(*The New China Review*)。^①作为一份英文刊物,该刊以在华传教士、外交官以及英语世界想到中国传教或担任外交事务的青年为主要读者群,由上海的别发印书馆(Kelly & Walsh Limited)发行。别发印书馆,是别发洋行的分公司,1870年成立于上海,负责人为施露(John Henry Searle)。前身是19世纪60年代英商沃尔什(F. G. Walsh)兄弟在上海黄浦滩开设的外文书店Kelly & Company。1885年,沃尔

^① 该刊由英国汉学家库寿龄于1919年创办于上海,别发印书馆刊行,前后共出版4卷,旨在继承1901年停刊的汉学刊物《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撰稿人主要是当时英美知名的汉学家如翟理斯、福开森、庄延龄、阿瑟·韦利等。该刊共出版4卷24期,1922年12月,因主编库寿龄去世而停刊。